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三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三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昆明市环城北路)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内部发行〕

云南省期刊出版登记证云出字第 079 号
定价：四角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十三辑目录

- 一、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
——北伐战争回忆录(续完)……梅 欣 (1)
- 二、昆明的《救国日报》与昆明的“五四运动”
……张天放口述 (23)
- 三、云南地下党早期学运、工运的片断
……高 怀 (35)
- 四、在频繁的战斗中成长(上)
——忆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三支队
……许南波 杨守笃 (51)
- 五、忆《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彭少彭 (80)
- 六、撒尼人民的好儿子——回忆毕恒光同志
……杨知勇 (93)
- 七、滇黔边区播乐中学中共特别支部
……杨泓光 (110)
- 八、江鹭同志简要生平……廖必均 廖必昌 (138)
- 九、昆明“战时书报供应所”回忆片断
……黎 旭 (146)
- 十、本刊第十一、十二辑勘误表……(149)
- 十一、本刊发行组通告二则……(150)

朱培德对政治工作 的“欢迎欢送”（续完）

——北伐战争回忆录——

梅 欣

九、初进南昌

朱培德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进驻南昌。随同他入城的部队，在市街行进时，每个团的排尾可以看见排头。伤亡是惨重的。但是胜利的战争，却给朱培德创造了扩充实力的有利条件。

最重要的兵源不成问题了。由湖南省农会和安源矿务局协助在萍乡招募的新兵四千多人，南昌攻下后不久，便已带到。留在后方的伤兵，在第二次牛行战役前，也陆续重返前线。

归第三军收容的俘虏，有几千人。赣南的杨如轩、杨池生残部，经朱培德多方活动保护，已绕道来到南昌听候改编。连在湘西苟延残喘的金汉鼎，也带

着残兵败将投奔而来。

原有的七、八两师补充起来了。第九师也编组成立，并扩编了一个炮兵团，一个军部警卫团。

在重要的人事安排上，杨希闵的三个“骁将”曾万钟被提升为第九师师长，韦杵被任用为第七师副师长，朱淮（原杨希闵部旅长）被任用为二十二团团长。李烈钧推荐的何臧被任用为军部副官长。十一个团长中，与朱培德有历史渊源的三人，与王均有历史渊源的三人，与李烈钧有关系的二人，属于旧滇军三杨系统的三人。在战斗中，连、排长的伤亡也很重，但这也不成问题。在广州收容杨希闵部属组成的第三军军官学校学生可以使用了。两杨残部，兵虽不多，官却不少。更加上各方面闲散的云南籍军官，纷纷前来投效。使朱培德完成将近十三个团（包括军部及各师的特种营在内）的官佐配备之外，还有多余，因而又成立了一个教育团来集训这些预备军官。

就全军说，云南籍的士兵虽然大大减少，但各级军官佐绝对多数都是云南人，朱培德的第三军依然构成一个纯粹地方性的控制系统。

论实力，虽然还远远落在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李宗仁、唐生智之后，但比起一九二五年在广州时期，朱培德的实际军力已经是成倍增长了。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胜利的朱培德已经拥有一个总指挥部，一个军部，三个师部，庞

大的军阀机构，营私舞弊、剋扣兵饷的风气，又是肆无忌惮的发展了，这就引起了士兵的严重不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份，那时刚入城不久，第八师的士兵为了过期很久还不发饷，拥入师司令部，把朱世贵捆出来，在南昌重要街道上游行了大半天。在其他各部队营房里，经常都听见士兵嘲骂。一些军需官家里，也发生士兵“光临抢劫”。朱培德、王均非常恐慌，把第八师全部调离了市区。一九二七年一月份，对第七师的营房里，连续不断利用各种藉口，进行了严密检查。子弹全部封存在团本部，士兵枕头下，衣袋里，干粮袋里以及床铺垫草中任何一部份隐藏着的零星子弹，都搜查干净。空枪在下操后都全部锁存在营本部。他们认为这是十分有效的措施。二月二日是旧历春节，这个月的兵饷，本来应该早几天至少应该早一天发放的。而总司令部在一日中午才用票面壹佰元、伍佰元的军用票发到军部，以后军部转师部，师部转团部，团部转营部，到了下午五时左右才转发到连部，而连部无法用巨额票面的军用票发到士兵手中，以致当晚的年夜饭不能添一个菜。事实上总司令部和军部是堆存着大批银币的，特别是总司令部堆存的数字很大。士兵们当然不能忍受这种无理的待遇，胜利是他们用鲜血换来，到了除夕之夜，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以及副官军需部门的若干长，都回公馆猜拳行令去了，而他们冷清清的坐着不能下咽的粗饭，听

到市区内热闹的鞭炮声，当然，他们愤怒了。第七师驻扎在东城外的营房，每团一个区，三个区都毗连着，傍晚时分，十九团首先发动，士兵大呼“到城里要饷去”！他们向连排长打了招呼，请不要干涉。于是纷纷到营部取了枪，到团部取了子弹，各人都把军衣口袋装满。营部、团部、师部、军部都有双岗卫兵，而卫兵是不会干涉自己的兄弟的。于是他们蜂拥入城，沿途向天鸣枪示威。入城后，首先把主要的电话线和电灯线割断了。没有进入一家居民和铺户，没有动弹过一点居民的财物。他们到达七师司令部时，找不到一个军官，他们把师长办公室和军需处捣毁了。在王均吸鸦片的房间里，把所有什物，打得粉碎，把王均的吸鸦片床铺和军衣、军帽、长统靴，用刺刀戳上万孔千洞。然后，又拥向军部去，路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那里的卫兵向他们开枪，他们还击，打伤了几个总部卫兵后，还是绕道去军部。进入军大门，他们要找参谋长黄实讲话，军官们都很慌乱地躲藏起来，央请一个连指导员出来说明当天发饷迟延原因。正当士兵们大声责骂之际，有的士兵发觉是政治工作人员在讲话，对大家说：“这是指导员讲的话，我们走罢。”于是他们才退出来。之后，他们分散了走遍市区主要街道，依然边走边向天鸣枪示威。最后，机枪营的士兵打听出王均的公馆，他们到了那里要找王均讲话，一个连长赶来，说了许多“好话”，

此时天已将明，士兵也有些疲倦，他们又退走了。全部都转回营房去，直到次晨，士兵都在安然睡觉，若干逃跑了的军官，到中午才逐渐转回来。二月二日（旧历元旦）上午，全师每个士兵发了三块现洋，并且是委托七师政治部主任亲自去发，看了没有什么额外问题，师长、团长才出来和士兵见面、讲话。之后，蒋介石从九江赶来，给王均记了大过二次，“以肃纪纲”，然后又亲自召见，“温慰有加”。总政治部邓主任，为了“市面未受抢劫”，并且，在事变中多数军官都逃跑了，而政治工作人员还能保持联系，对七师政治部“传令嘉奖”。

这是危机的一面，一个例子。

朱培德抓住了军阀军队的组织关键，在全军建立了地方性的控制系统。然而，正是这些军官具有强烈的地方观念，深沉的军阀军队作风。这就不能不在官兵关系中，产生深刻矛盾。萍乡招来的湘赣籍新兵，首先就发生极大的反感。这些新兵，多数都是第一次出来当兵的，他们为北伐军的标语口号鼓动而来。但是入伍以后，一切环境都变了，他们在生活活动上的遭遇，完全和初来时的朴素愿望相抵触，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被投入监狱里。至于北方籍的俘虏，由于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关系，更是惴惴不安，孙传芳又不断地秘密派人携带金钱来诱惑收买。士兵逃跑现象一天天滋长起来了。一、二月间，各师都有上千的空额。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政治工作在第三军开展以来，经历了在广东的整训时期，湖南的行军时期，江西的作战时期。对朱培德说来，都是十分满意的。朱培德很清楚，政治工作替他巩固了军队组织，鼓舞了士气，解决了他所不能解决的民众助力，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替他撑持了“革命”门面，使他有了政治活动本钱。最重要的是，政治工作，一点也没有动摇他对军队的掌握权力。自然，他对政治工作是十分满意，而且十分感兴趣了。在牛行战役结束时，他对军政治部朱主任说：

“我这班军官，可以说都是身经百战的，现在看起来，还有点不如你那班青年学生。让他们好好地干吧！”

如何解决进入南昌后的新问题，朱培德还是看重了政治工作。一月份起，先后把三个师的政治部都建立起来，在广州的政治训练班学员，绝大多数都调来了。除了团、营政治指导员外，所有的连，都派出了政治指导员。他并重托了九师政治部主任，要特别注意对俘虏兵的宣传教育。

十、在尖锐的斗争中

由于“五卅”、“六·二三”反帝运动在全国形成的形势，以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由于

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的英勇奋斗，终于使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北伐军的口号标语，在工农群众看来，应该是要兑现了。他们不仅希望革命政府能够实现它的号召，而且有勇气用行动来促使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得以实现。湖北、江西两省相继克复后，武汉、九江、南昌的工人，便积极行动起来，汉口、九江的租界，便是由群众的直接行动收回来的。组织起来的群众革命活动，摇撼到与帝国主义、军阀相依为命的封建势力。在南昌，作为封建势力不可侵犯的偶像张天师，被工会扣押起来了。在农村里，农会的组织和活动，朝着湖南的方向，向前发展，攻击矛头指向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在反动派看来，真是大逆不道的事。自从广州“三月二十”事变后，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中心，所有国民党的新老右派，失意军阀政客、买办资本家、地主豪绅、帮会流氓，都象群蝇逐臭，趋附蒋家门下。湖南、湖北、江西农民给予北伐军热情积极的支持，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恐惧和仇恨。还在北伐军行进中，由蒋介石指使操纵的各色各样的反革命活动，便伺隙猖獗起来。战争胜利初期，仅江西几个大城市，一九二七年一月，赣州发生新编一师驱逐政治工作人员事件，A B团倪弼惨杀陈赞贤事件。三月十七日，蒋介石直接指挥暴徒捣毁九江总工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九江市党部，并打死打伤大批工人。在南昌，反动集团段锡朋、周利生、程天

放、罗实时等，利用国民党省党部，公然以反对“三大政策”相号召，对南昌总工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南昌市党部，进行种种阴谋打击活动，气焰非常嚣张。但是他们的行径十分卑鄙，非常不得人心。他们曾经组织过保护张天师游行，用金钱收买了二三十个浪人，抬着拥护蒋总司令、拥护张天师的标语，到各机关请愿，见者多嗤之以鼻。所以他们的活动只有倚靠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和李烈钧的省政府为之保镖。终于在三月中旬，蒋介石离开南昌前夕，下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

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如此尖锐发展的时候，朱培德采取了稳坐钓鱼船静观变化的态度。他利用当时在南昌的军事权力机关是总司令部，高级行政机关是省政府，与群众团体发生直接关系的是各级政治部，他便从斗争的空隙中抽身出来，看风使舵。

从外表看，朱培德是那么“超然”。他使人没有看见他直接参与蒋介石组织反革命活动，也没有看见他直接支持反动派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对李烈钧行使省政府职权，还不买账。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还是一个忠顺的将领，对李烈钧还是一个恭谨的旧部属，而南昌的士绅们，则把他奉承为一个谦逊礼贤的长官。

自然，这样的骑墙态度，并不能欺骗一切人。当蒋介石企图把“国民政府”扣留在南昌的阴谋失败

后，蒋介石与武汉的对立公开化了，江西的反革命活动也更加猖狂了。军政治部负责人一再向朱培德提出劝告，希望他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保持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光荣。而他的答复总是圆滑得摸不到边际。

直到蒋介石积极布置东征，第三军也被拟议编入作战序列，朱培德苦闷起来了。三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几个政治部负责人和他的参谋长黄实又在谈论当时形势，特别指出，自汉浔租界收回后，群众运动日益高涨，革命空气非常浓厚，武汉政府的政治影响，在国内外都更加扩大了。只有顺应潮流，向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前进，革命才能成功。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正是要破坏革命。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希望第三军要鲜明地站出来拥护武汉政府，不要再沉默迟疑了。黄实听后说：“请几位在此稍待片刻，我到总指挥家里走一趟就来。”不到一小时，他转来了，据他传达：“总指挥说，他追随总理多年，服膺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永远不变。介石倒行逆施，他很痛恨。他要拥护武汉政府到底。他派我明天就去汉口，表明本军态度，一切还要仰仗几位帮忙。”黄实果然去了汉口。不久，武汉政府明令任命王均管理南昌卫戍事宜。这样，就使第三军获得在江西扎根的初步合法地位。

此外，朱培德又被任命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王

均被任命为第三军军长。原已被任命的独立第十六师师长金汉鼎被任命为第九军军长，隶属朱培德。第九军的三个师长杨池生、杨如轩、韦杵也安排定了，这就给朱培德继续扩充实力，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朱培德“积极”起来了。本来他曾经一再“信赖”过政治工作，那只是想利用它作为巩固军队的工具而已。当朱德同志到南昌访问，他尊之为上宾，政治问题向他请教，军事教育也向他请教，以至请他担任教育团团长，也不过是借以达到他欺骗性的政治宣传目的。而现在，他要利用他们来取得江西政权。从此他不断通过政治部向群众团体和国民党左派表示他的“革命决心”。

北伐军的政治旗帜，虽然非常鲜明，但是朱培德和其他大军长们，则是各有各的如意算盘的。在江西作战时期，他经常谈论的只是：谭组庵已高居中央，李任潮已拥有广东，黄季宽还保持住广西，唐孟潇新得志于湖南。言下大有江西政权“捨我其谁”之概。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一野心当做幻想，而是充分利用着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矛盾，不放弃一小点可乘的机会，积极进行活动的。他之所以在充实实力地位上，下了不少工夫，就是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现在的关键，是要集中在蒋介石与武汉政府之间的矛盾上面玩手腕了。

对蒋介石，他之所以采取“不即不离，若即若离”

的态度。这是因为蒋介石还拥有总司令的军权，闹翻不得，而蒋朱之间长期的军事实力磨擦，猜忌已深，信任不得。况且东征的战事尚未开始，胜负未可知，更不能不保留观望。

至于现在对武汉政府，就只有“宁肯左些但要滑些”了。这是因为武汉政府究竟是发布政令的最高机关，必须倚靠它。它正享有国内外的政治威望，必须迎合它。它还不是一个单一的实力集团，无须怕它。它可能还有变化，必须抓紧时间加以利用，而又不要为它绊住脚。

算盘打定后，他把复杂的南昌局面推开了，反正留王均守着是可以装聋推哑的，三月中旬他便“超然远行”，溜往九江蹲起来了。

南昌市党部虽然被“解散”，但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总工会等群众团体组织的群众运动，并未停止。国民党左派也还是照旧活动。段锡朋等那班反革命头子很不甘心，也很恐慌。他们企图在张群和总司令部撤离以前，作最后挣扎。他们一贯进行的反动宣传，说什么武汉实行“共产公妻”“裸体游行”，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人们已经听厌了，不相信了。他们转而收买流氓打手，阴谋照抄蒋介石在九江的殴打残杀手法，在社会上制造混乱，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南昌的恐怖气氛浓厚起来了。王均曾经两次派专人到九江，向朱培德请示应付“机宜”，而朱

培德的答复，总是说些“追随总理多年”这类的空话，骨子里则是不要直接出面干涉。后来据七师司令部派出的谍报人员报告，段锡朋们已安排好要暗杀王均和七师政治部主任，王均既已成为直接打击对象，他恼火了。当夜即把驻城外的一部份队伍调进城来，作出戒严姿态。并通过他的参谋副官，而不是通过政治部，向外宣称，如果省党部竟敢乱来，则他有治安责任，将和他们周旋到底。果然，这一虚张声势，段锡朋们有些敛迹了。这主要还是由于总司令部残留南昌的部队，已不足一师人，张群又在敷衍王均。段锡朋等既已失去有力靠山，胆子自然小下去了。直到武汉政府已明令改组江西省政府，张群也将离开南昌，这班狐群狗党正计划分头逃窜，而朱培德、王均还没有给予反动派以打击的决心。总工会在四月二日解决了省党部，捉住了程天放、罗实时等二十多个反革命份子。袖手旁观的王均则以维护革命秩序得力，被人称赞。

蒋介石既要离开江西，当然不愿意模稜两可的朱培德在江西坐大起来。所以，布置东征，他还是拉上朱培德的两个师。朱培德到九江后，就集中全力，应付这一难题。对蒋介石不放心，对他自己新扩充起来的第三军内部，也不放心。在这一问题上，真是极尽了钩心斗角之能事。外表上，他派遣了朱世贵、曾万钟率领八、九两师随同蒋介石东下，而实际上，他是

以团为单位，把七、八、九三个师的兵力岔开来混合编组，使其互相牵制，确保他的掌握。蒋介石也不示弱，八、九两师由九江出发后，他把曾万钟拨归程潜指挥，把朱世贵拨归李宗仁指挥，使第三军失去了作为一个实力集团的作用。双方的斗争加剧了。朱培德的特使黄实更频繁地跑汉口，“表明态度”，力促早日改组江西省政府。蒋介石则使用了各种收买手段，拉拢朱世贵和曾万钟。曾万钟上钩了，消息从各方面传来，当朱世贵还在安庆曾万钟已到达当涂时，消息得到了证实。朱培德采取了最敏捷的方法，在南京易手后不多几天，曾万钟所率领的第九师，便全部撤回到九江。

武汉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的明令发表后，由于朱培德当了主席，王均当了委员，黄实当了财政厅长，朱培德当然是满意的。为了接受这一到手的富贵，朱培德表现得更活跃了。总政治部郭沫若副主任从安庆脱离蒋介石来到九江、南昌时，受到朱培德、王均多么“亲切”的接待，并且对郭副主任的安全，更是“关心备至”，王均拨了八名卫兵交给七师政治部主任，负起保护专责。郭副主任在南昌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他们虽然有点“那个”，但也未加阻拦。

四月五日，朱培德偕同新任命的江西省府委员和省党部筹备委员由九江回到南昌之后，举行了一个

群众大会，省府委员举行了就职典礼。发表了一篇宣言，是朱培德请郭副主任代写的，当然足以表达“革命决心”。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同志兼任省府秘书长，不仅是经过朱培德同意，而且他也推荐过。省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朱德同志兼任南昌公安局长。第七师政治部主任被任命兼任卫戍司令部军法处长，所有总工会拘捕的反革命罪犯，由军法处接收管押。这些就是朱培德接印视事后的大杰作，真是奸狡极了，它使人们看起来，似乎是“左得可爱”的知人善任。事实上，他是把对反动派的斗争从表到里的责任都推卸干净了。除此而外，他不再发一言，省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后，他又溜往九江去了。

十一、原形毕露

经过北伐战争后扩充起来的朱培德集团，依然是一个十足的封建集团。这个集团，以派系复杂，地方性浓厚为其特点。到南昌后，已不象过去的环境条件那样简单，而是置身在阶级矛盾突出的全国性政治斗争中，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势力集团，其阶级本性日益暴露出来，派系关系，地方系统的作用，已退居次要地位了。

他们和江西绅士一鼻孔出气，关心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关心武汉“共产公妻”。在南昌，工人、